“重走斯诺路”，汲取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二万五千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

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更以罕见的包容性，汇聚了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朝鲜、越南等多国的外籍革命者、观察者与援助者。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以一手采访、实地记录，向世界描述长征真实图景，填补了全球舆论对这场远征的认知空白。

美国医生马海德，与斯诺一同抵达陕北，为边区的战士和群众诊治疾病，支持中国革命事业，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长征从来不是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这些跨越山海来到红军身边的外国人，是连接东方革命历程与世界文明进程的桥梁，他们的见证，让这场远征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历史重量。

7月初，斯诺、马海德的后人和专家学者齐聚宁夏同心，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以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



7月6日，埃德加·斯诺后人（左二）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参观。墙上为埃德加·斯诺的经典照片《抗战之声》。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在西征前线读懂红军“不可战胜”

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以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为原型的雕塑巍然矗立。红军号兵昂首向天，军号微倾，仿佛正吹响嘹亮号角。

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举起摄像机拍摄。他说：“这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

号兵，在斯诺笔下被视作红色中国的象征。《红星照耀中国》的经典封面——《抗战之声》，正是1936年斯诺在宁夏豫旺县（今同心县）实地拍摄的红军战士剪影。这个鲜活的号兵形象，经过万里长征浴血跋涉的洗礼，更凸显了红军队伍年轻、奋发、不屈的时代精神。

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甘冒风险参加红军？是什么支撑他们经历封锁、缺盐、疾病、瘟疫，走完历史性长征？这一系列追问让当时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斯诺深感困惑。

“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1936年6月，斯诺辗转进入陕北，成为首位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他：“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

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扎地豫旺县，足迹遍及豫旺堡、下马关、红城水、吊堡子等地。

清晨“在豫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斯诺对红军的预设。他在书中写道：“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些这样的模糊观念。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完全错了。红军的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

在斯诺的笔下，历经长征淬炼的青年战士是红色中国最鲜活的精神象征。他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其观察，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西征前线之行是这名美国记者完成对长征史实认知闭环的关键一站，也为这部经典奠定了走向全球的事实根基。

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豫旺县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豫旺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

“洋医生”留在根据地行医问诊

在红军西征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铭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

90年前，在豫旺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军民治病。

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豫旺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3个多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铭德转述了爷爷周幼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

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

在延安时，马海德白天行医问诊，晚上还帮忙收发“消息”。据周幼马回忆，每天晚上，新华社的同志爬上清凉山，在窑洞外搭一条长长的天线，用手摇发电机带动一台收音机。“父亲将收听到的英文、法文消息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消息被翻译成中文油印成册。父亲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

分别36年后，当斯诺在瑞士病重，马海德带队前往救治。见到斯诺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豫旺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

从跨海而来的医学博士，到亲眼见证苦难的观察者，最终成为与红军同甘共苦、扎根根据地的革命同道者，马海德在豫旺堡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抉择。他用数十载的行医与坚守作答：一支历经长征淬炼、官兵平等、心系穷苦百姓的队伍，值得毕生相托。

外籍亲历者见证长征胜利

长征的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

一位被迫参加了长征的外国人，以“局外人”的视角意外见证了历史。

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五省，历时560余天，行程万余里。

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薄复礼，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中医。行军期间，薄复礼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

1936年4月，薄复礼获释后，完成回忆录《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一年，是西方首部由亲历者撰写的长征纪实。

薄复礼的记录解答了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书中写道，很多红军指战员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第三方视角的长征亲历记，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

除外籍亲历观察者外，红军队伍中还有一批深耕革命的外籍战士，他们将个人命运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

越南籍将领洪水，因支持正确革命路线，先后被博古、张国焘打成“特务”与“国际间谍”，两次被开除党籍，却信念如磐，三过雪山草地，甚至乔装乞丐徒步乞讨返回延安。

朝鲜籍战将毕士悌、武亭更是屡立战功。毕士悌率部血战湘江、一日强行军60公里抢占娄山关、冒死攀越绝壁夺取通安州，为红军杀出多条血路；“红军炮兵的鼻祖”武亭不仅在娄山关以精准炮火摧城拔寨，更在张国焘分裂革命的危急时刻，携带新编密码本孤身穿越险境，成功联络红一军团，挫败分裂阴谋。

这些外籍革命者并未止步于长征终点。毕士悌在挺进抗日前线、东渡黄河时壮烈牺牲；武亭回到朝鲜后成为朝军重要将领；洪水辗转中越两国征战，成为两国军队中唯一的“双料”将军……他们用生命诠释了长征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更是人类正义事业与国际友谊的不朽丰碑。

九十载精神回响历久弥新

盛夏时节，驱车行驶在有“红军西征路”之称的王预公路上，只见公路两旁草木葱茏，远处山坡绿意盎然，风力发电机迎风转动。斯诺笔下曾经干旱荒凉、沟壑纵横的同心，而今已换了容颜。

红军西征纪念馆里，悠扬号声不时响起。一件件革命文物、一份份文献史料、一张张珍贵影像，完整再现了红军西征驻留同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光辉历程。一批批青少年、干部群众走进纪念馆和红色遗址，汲取信仰的力量。

如今的同心，把红色资源越用越活。同心县委书记陈华说，依托红军西征纪念馆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旧址，让沉睡的遗址“活”起来，打造出集瞻仰、研学于一体的红色教育新高地；深耕“红色+”文旅融合，让厚重的记忆“热”起来，推出沉浸式党课与情景剧，带火了全域旅游新线路；借力闽宁协作与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让革命的馈赠“实”起来，发展红色民宿与特色种养，让老区群众端稳“红色饭碗”。

近日，由新华社研究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办的“重走斯诺路”活动在同心举行。同心这座红色小城迎来斯诺、马海德的后人和专家学者，这仿佛是一种历史的回响，同心“红色IP”的国际影响力正从史料走向现实，长征精神的火种仍在传递。

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希德妮·伍德说，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

孙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力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

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斯诺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政权的筹备过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首任主席马和福烈士的后人马小玲说：“我常常问自己，革命先辈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我们这一代人，如何回应这个时代的期待？我深切感到，要让红色文化从‘被看见’变成‘被感知’，从‘被记住’变成‘被传承’。”

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纪念基金会接续开展跨国学术交流，马海德后人倾力传承先辈红色友谊……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据《参考消息》**）

郑旗堡战斗遗址



郑旗堡战斗遗址。

郑旗堡战斗遗址，位于海原县城东部郑旗乡郑旗村一带。1936年9月中旬，为了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红二师骑兵第二团曾在这里与国民党马鸿宾部进行过战斗。2021年10月，海原县政府在郑旗村立碑标识。

1936年5月18日，党中央发布了西征命令及西征战役计划，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9月初，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主力挺进西兰公路，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按照党中央要求，西方野战军主力自豫旺城一带全面出击，首先占领了同心城、王团庄、李旺堡、七营一线，然后左右两路出击，一路攻占关桥堡，向干盐池、打拉池方向开进；一路攻占郑旗堡，向沐家营（今西吉县城）方向开进。而此时，红二、四方面军也加快北上进程，目标直指甘肃会宁、静宁一线。

9月11日，红一军团沿吊堡子、七营方向南下，并以红一师（师长陈赓）和红一军团直属骑兵团组成特别支队，由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直插静宁、隆德地区，以保证三大主力会师时左翼的安全。为了打通南下通道，左路军总指挥左权决定，消灭驻防郑旗堡的马鸿宾部骑兵团，占领郑旗堡。

郑旗堡是海原、固原通道上的一个要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占领郑旗堡对阻止国民党军队西进和南下，保障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特别支队的安全至关重要。左权率领红二师师长杨得志来到郑旗堡后，经过勘察地形，决定由骑兵第二团团长梁兴初率部先渡过苋麻河，由南向北攻击，阻击隆德方向敌人的增援，并切断敌人向南溃退的道路，再由主力由东向西攻击。

9月12日清晨，攻击郑旗堡的战斗打响。攻击部队按照作战部署，迅速进入阵地。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午后，终于占领了郑旗堡。这场战斗，歼灭敌马鸿宾三十五师及东北军骑兵第三、第十师各一部，击溃国民党马培清骑兵团3个营。随后，左权率领红一军团主力在七营镇、郑旗堡之间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苏区，伺机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国民党军退出郑旗堡后，撤往相距不远的撒家台，占领了撒家台的几个堡寨，据寨防守，与驻扎在郑旗堡的红军对峙。当天夜里，总指挥左权率红二师主力向撒家台国民党军马培清部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发起攻击。在激战中，红军处于高地，利用地形优势，居高临下向国民党军射击，使敌军处于不利局面，战斗一直持续到天明。13日早晨，红军决定撤出撒家台并退回郑旗堡。

红军占领郑旗堡后，聂荣臻率特别支队于9月12日经郑旗堡顺利南下，向沐家营一带开进。14日，特别支队占领了隆德县的隆德城、硝河城和将台堡等重要城堡，控制了隆（德）静（宁）大道。15日，左权获悉国民党骑兵第六师向七营镇一带推进，其一部进入李旺堡。左权立即命令在七营镇以北的部队阻击国民党军队的前进。军团骑兵第二团一部与教导营迅速赶往李旺堡，将国民党军队包围在土围子内，切断这支国民党军队与主力的联络。16日，国民党骑兵第六师企图解李旺堡之围，调集兵力向围困李旺堡的红一军团部队攻击。左权命令红二师协同骑兵第二团和教导营共同打击增援的国民党军队。经过激战，歼灭第六师两个团大部。18日，红军占领静宁县的界石铺，控制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静（宁）会（宁）地区会师的主动权。（**据宁夏党史教育**）



关中师范学校旧址。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的劳动建校活动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经济条件相对良好，但由于接近国民党统治区域，原先建立在关中分区的学校先后迁徙到延安。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临近国统区的状况更是要求关中分区加强宣传动员，夯实群众基础，对师范学校有较大需求。鉴于此，1939年9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在关中分区成立第二师范学校，明确规定办学宗旨为“培养地方文教干部和小学师资”。1943年1月，第二师范学校迁至陕西省咸阳市马栏镇，改称关中师范学校。

1940年，第二师范学校成立后利用鲁迅师范学校原有校舍展开教学，但条件比较简陋，限制了办学规模。于是，从1941年9月底起，第二师范学校停课50天，开展劳动建校活动。这场建校活动既是第二师范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劳动教育开展普及极具代表性的事件，为此，学校为纪念这一活动，将其定名为“十月劳动建校节”。

第二师范学校师生对建校工作热情高涨，随着建校工作的准备，宣传、组织、设计、施工等各个方面有条不紊地展开，不仅设计施工体现了劳动的专业性，宣传和组织更是彰显了第二师范学校师生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建校活动通过文化娱乐、慰问表扬、开展劳动竞赛等多种方式激发了广大师生的劳动积极性，弘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劳动创造新世界”的思想作风，切实扩大了建校活动作为一次劳动教育实践的影响力。

为了组织好宣传工作，第二师范学校专门设立宣传股，组织各种文艺活动，创办《新垦地》墙报，最具特点的是根据建校活动不同时期，针对师生的情绪，有的放矢，制定宣传口号。在“大干五十天，建设新校园”的总口号下，全校师生因过于忘我地投入活动，造成不听劝阻、日夜加班赶工的现象，对此，学校研究后提出了“反对拼命主义”“看谁不慌不忙”的口号。活动过半，面对师生出现的倦怠情绪，学校又提出“看谁的坚持精神好”“既要有耐心，更要有恒心”的口号，到了工程末尾，学校提出“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看谁是最后的英雄”等口号。这些宣传口号的制定反映出学校领导班子认识到劳动积极性普遍高涨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的提高，正确的鼓励引导不仅能有效促进建校活动，还能让师生在劳动中锻造实事求是的认知能力。当时有校友回忆建校工作中的点滴：“就是对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早已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的实际运用。”

从组织层面看，建校活动的组织工作有层次、有系统，反映了延安时期党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所积累的经验。50天的停课时间对于建设新学校来说并不充裕，而且耽搁了正常的教学活动，所以学校在建校活动伊始就把教学组织改编成了劳动大队组织，进而保证高效完成任务。具体来看，学校成立了劳动大队部，下设劳动队、技术团、宣传股和管理供应部，基本上涵盖了建校以来的劳动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和宣传管理工作。劳动队以学生为主体，原来的班主任改为各小队的政治指导员。技术团下设各种专项技术组，负责打窑、木工、泥工等技术工作。技术团的负责人经常走访、邀请相关技术经验丰富的农民指导，充分体现了当时工程组织尊重技术、崇尚科学的认识。

从学生对劳动建校的感悟看，建校活动是一场极具地域特色的劳动教育实践，学生增长了知识才干，思想品德也有了极大提高，建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让师生了解到什么是“劳动创造世界”。当时在第二师范学校任教的季达回忆说，彼时的第二师范学校，努力破除千年来学而优则仕、轻视劳动的传统认知，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参加建校活动培养了学生们的劳动观点和可贵的革命作风”。与此同时，广大师生在建校过程中学到了理论知识以外的实践经验。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杨树森回忆当时参加技术团的经历：“学到了不少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特别是涉及指导思想和工作方式方法上带有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王明哲回忆，建校活动让他学会了丈量土地，面对规则的土地当然很容易套用数学知识，但是不规则的土地就必须用“抽长补短、抽大头补小头的办法拼成方形丈量”。这些计算方法是课堂上没有学到的，完全是从经过培训的农村秀才和技术团那里学来的，建校活动结束后，通过学习才逐步掌握。在建校活动中，许多师生通过劳动拓宽了视野，认识到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的差距。

第二师范学校的建校活动时值抗战时期，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已经初步积累了经验，劳动教育的开展使办学活动能够克服物资匮乏的困难，努力培养适应形势的革命人才，服务于抗战的大局。

不过，尽管劳动教育要素已经较普遍地存在于边区的教育系统，但像第二师范学校这样从建校起就依靠师生劳动的例子并不多见，第二师范学校也在这场特殊的活动中探索出了别样的劳动教育经验。首先，建校活动是一场师生共同参与的实践，师生互相学习、互相督促提高，学生的提高自不必多言，老师也普遍觉得“他们既是教育者，又受到了教育”。第二师范学校副校长刘端棻回忆建校活动“让他深刻感受到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更加用心地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汲取营养”。其次，第二师范学校建校活动所蕴含的劳动教育因素并非只有单纯的体力劳动，组织、宣传、施工各方面也都井井有条，并衍生出许多活动，比如颂扬劳动模范、歌颂先进人物、练习写作稿件，烘托了劳动氛围，更是第二师范学校师生在劳动中接受教育、在教育中促进劳动的体现。第二师范学校语文老师黄流提到，建校活动“实际上是我进行语文教学、向大家学习、受到劳动教育、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的开端。这是劳动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一例”。从第二师范学校的建校活动可以看出，当时开展劳动教育已经成为各项活动不可或缺的因素。（**据《团结报》**）